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对

农业问题的认识和探索



李 伟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本书为鲁东大学著作出版资金项目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

中国共产党对农业问题的

认识和探索

李 伟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对农业问题的认识和探索/李伟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80199—811—8

I. 二… II. 李… III. 中国共产党—农业经济—研究—20 世纪 IV. F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9050 号

书 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对 农业问题的认识和探索

作 者:李 伟

责任编辑:高秀清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密兴印刷厂

开 本:148mm×210mm 1/32

字 数:192 千字

印 张:9.25

印 数:1—2000 册

版 次: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99—811—8

定 价:22.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 82517244

序 言

对于现今 60 岁以上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发生在近半个世纪前,即 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大凡都还记忆犹新。

1958 年的 5 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精神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各条战线普遍开展起来。特别是 1958 年下半年,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几乎把每一个人都卷了进来。

那一年,我 14 岁,在上海市徐汇中学读初中,由初一升初二。由于所从事专业带来的“职业病”,这些年时常会回忆起当年的一些事,回想当年自己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对 1958 年来说,有几件事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成为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

第一件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公布后,政治课老师

迅速调整教学内容,把教科书暂时搁置一边,给我们讲解这条总路线。我们还在老师的指导下,编写宣传总路线的顺口溜,并走上街头、深入弄堂,用“杨柳青”这样的民间小调演唱,向周围的群众宣传总路线。这是我第一次走上街头,面对众人又说又唱。那时竟没有一点儿胆怯甚至害羞。

第二件事,“大跃进”运动开展后,各行各业都要定指标。教育也要“大跃进”。我所在的徐汇中学,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初中生,也不例外。记得1958年9月,新学年开始,学校召开教育“大跃进”誓师大会。班主任要我代表全班同学发言。怎么办?当时,我是班里的代数课代表。在老师的启发下,我在发言中表态,我们初二年级的小同学,在新学年里,不仅要学完规定的平面几何,还要学完高中阶段的立体几何甚至解析几何、微积分。可当时,我连起码的数学知识都不甚了了。这是我第一次说大话,那时竟没有一点儿的不安或羞愧,反而感到很自豪,是听党的话、跟毛主席走的表现。

第三件事,刚升入初二,就赶上大炼钢铁运动。为了完成追加的当年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的任务,全国上下齐动员,掀起了一场土法炼铁炼钢的群众运动。我们学校也不例外。学校两个拥有400米跑道的大操场,成了大炼钢铁的战场。高中的学哥、学姐都直接投入到建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铁炼钢的战斗之中。我们初中的学弟、学妹则到处拣废钢铁,为小土高炉提供原材料。学校为我们规定了任务,每人每天要上交一定

数量的废钢铁。为了完成定额,我们利用课余时间,有时甚至停课,到郊外的河边、道路旁,挖地三尺,寻找废钢铁。有的同学还用大铁锤砸向标有“不准破坏”的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修筑的碉堡,以便取出混凝土中的钢筋。不少同学还把家中的铁锅、铁铲等都拿出来上交学校,否则难以完成任务。

第四件事,1958年下半年,先是在农村,后扩展到城市,人民公社一哄而起。那时,我家因1956年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回到了上海近郊漕河泾以北的乡下老屋。那里也办起了人民公社,我家所在的村子成为虹桥人民公社管辖下的一个生产小队。紧接着就是大办公共食堂,暑期的某一天,我家对面小河边的空地上变魔术般地修起了几间大茅草房。这是生产队新建的公共食堂。那些日子,公共食堂开饭的钟声一响,村里的男女老少,拿着锅碗瓢盆,争先恐后地抢着到公共食堂,真有放开肚皮饱吃一顿之势。那时正是盛夏,社员们一天出两次工,早上四五点到八九点一次,下午三四点到七八点一次,中午有很长的休息时间。可是,下午那次出工,生产队长拿着哨子,从村东头吹到村西头,又从村西头吹到村东头,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出工的社员还是稀稀拉拉、无精打采。这是我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年代看到的另一面真实情景,和那时宣传的冲天干劲、热火朝天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历史教科书中,类似上述的这些事是不会记述的。但它们是历史的真实,是社会下层民众的亲身经历。通

过它们,可以见微知著,从某个侧面把握历史的真相。

对当年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或“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早已有权威性的历史结论。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①

历史是很好的教科书。自那以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逐渐成为历史研究者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当年的这些运动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又是如何发动,成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的?运动又有哪些特点?造成了哪些后果?如何评价它们?这些运动留下了哪些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9页。

遗产,对今天有怎样的启迪?等等。这些都成为研究者力图探讨、阐明的课题。

我以为,仅就“大跃进”而言,它的历史遗产是极其丰富的。其中,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建设性的,也有破坏性的。

有形的,主要是物质层面的。一些历史研究者在评价“大跃进”运动时,往往强调那个年代留下的建设成果。这是可以理解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有这样一句话:“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①。《决议》中所说的这个时期是指“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包括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应该看到,“大跃进”年代留下了一批建设成果,其中有工矿企业、农田水利设施(主要是水库)和教学科研机构等。1960年,我升入高中,就读于上海师范学院工农预科(今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就是1958年“大跃进”年代创办的。明年是母校创办50周年,母校成立了校庆办公室。全国现存的上千所高等院校中,有一些就是1958年办起来的,近50年来,为国家的建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不看到这一点,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但是,仅仅强调这一方面,而不注意到事物的另一方面,即“大跃进”运动付出的代价、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同样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例如,“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资源和环境的破坏,我曾经让我的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研究生写一篇这方面的学位论文,但是,苦于历史资料的匮乏,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也许这是一笔算不清的历史糊涂账。但是,客观事实是不容否定的。

无形的,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所提到的“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这些都是积极的方面,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应该继续发扬光大的精神。但是,《决议》中提到的“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以及“瞎指挥、浮夸风”等,又是消极的、破坏性的。可以说,这些背离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坏作风、坏习气,至今还没有销声匿迹。在当今的一些地方官员身上,我们似乎经常会看到当年“大跃进”运动时某些历史情景的再现。

总的来说,不仅是“大跃进”运动,大凡历史上某个事件留下的积极的、建设性的遗产,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显性的、隐性的,我们都要很好地继承;而那些消极的、破坏性的遗产,我们更要认真总结,特别是那些隐性的,要下苦功夫、花大力气,深入地探寻、挖掘,以免重犯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善于从错误中走出来的。这是从宏观上,从历史规律、发展趋势的角度说的。而另一方面,一些党员干部重犯历史错误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凡是担负一定领导责任的人,都应该懂得了解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

执政历史,从历史认知中提高识别正确与错误的能力。

2003年,李伟同志通过考试成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的一名博士研究生,我是他的指导老师。入学后,李伟就在思考学位论文的选题。我也同他多次交换意见,最后确定以1958年的农业“大跃进”为论文选题,并通过了开题报告。在写作过程中,李伟很勤奋,一方面努力吸收、消化已有的研究成果,作为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挖掘、利用新的档案资料,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李伟完成了论文的创作,并顺利通过了论文评阅和答辩,得到评阅专家和答辩委员们的好评。之后,李伟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修改和补充。在中共党史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下,李伟的博士学位论文即将出版。他邀请我写一篇序言。于是,拉拉扯扯说了上面的一些话,仅仅是自己的点滴回忆与思考,聊以为序。

王 顺 生

2007年9月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农业“大跃进”前的中国农业 /12

- 一、农业严重落后,拖了工业的后腿 /12
- 二、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外流现象突出 /17
- 三、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基础不牢 /25

第二章 农业可以实现“大跃进” /30

- 一、农业“大跃进”的理论依据 /30
- 二、农业“大跃进”的政治运作 /55

第三章 农业经济发展的措施 /90

- 一、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建设运动 /90
- 二、广泛开展农业技术革新运动 /111
- 三、鼓励和推广农作物高产“卫星” /114
- 四、大力发展农村工业 /121

第四章 农村经济体制的构建 /130

- 一、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经济制度的变革 /130
- 二、新经济制度的设计 /134
- 三、人民公社的成立 /137
- 四、生产、生活方式的“创新” /147

第五章 农业“大跃进”的特点 /157

- 一、风起云涌、土洋结合 /157
- 二、全民动员,运动激发干劲 /159
- 三、“三化”管理,实行兵团作战 /161
- 四、“五风”泛滥,引发社会失序 /166

第六章 农业“大跃进”的影响 /178

- 一、农业“大跃进”运动的积极意义 /178
- 二、农村社会“变迁”过快,呈现非良性运行 /190
- 三、农业“大跃进”运动实现了对农村的全面控制 /196
- 四、农业“大跃进”运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重大损失 /215

第七章 农业“大跃进”的反思 /244

- 一、与时俱进,适时转换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 /245
- 二、遵循规律,高度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 /250
- 三、力戒浮夸,科学把握政治社会化目标与现实的关系 /257

四、提升素质,大力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
监督 /262

五、体恤民情,珍惜民力,切实确保农民权利 /268

六、以人为本,努力塑造现代人格 /273

主要参考文献 /277

后 记 /284

导 论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曾经创造出了在世界领先的农业文明。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已经是一个农业发展非常成熟的文明国家,她以高度、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维持着这个东方大国在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吸引着众多的各国人士前来观光和学习。一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一部农业发展的辉煌史。近代以来,随着外国列强的侵入,中国的传统农业发展被打破,农业的发展步履艰难,在近一个世纪的进程中都没有机会和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腾飞。新中国成立,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和政治条件。“一五”计划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使人们以为中国摆脱落后的面貌,并不需要像原来设想的那样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就能使经济建设的速度更快一些。农业的落后,不仅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也为党和政府改变农村的经济体制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发展道路就成了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于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揭开农业“大跃

进”的序幕，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也在运动中得到全面贯彻和实施。但农业“大跃进”结果并没有实现人们心中百余年的强国之梦，它在给人们带来激情和憧憬之外，更多的是带来了失望和苦难。三年的农业“大跃进”，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次悲壮实践。如何评价农业“大跃进”这一重大事件？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农业政策？它对于今天我们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的。

本书以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社会为背景，从农业入手，以众多的山东农业“大跃进”的档案材料作为依据，记述“大跃进”时期党和政府对农业的认识和探索过程，展示跌宕起伏的农业“大跃进”运动的全貌，考察农业经济在这种重大变革中的发展状况以及农村社会各阶层民众价值观念、社会心态等因素，研究这一时期国家、乡村社会与民众的关系模式及其特点，注重党和政府在这一时期的农业政策、行为分析，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以事实为据，用事实说话，旨在充实农业“大跃进”研究的成果，表达对这一重大事件的认识与思考。

本书就“大跃进”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业问题的认识和探索分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大跃进”前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生产水平落后，自然灾害严重，农业抗自然的能力弱小，拖了工业的后腿。随着政治的稳定，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再生产出现了 1950 年至 1957 年的第一次生育高峰，人口增长率高，就业压力增大，劳动力严重过剩，农村劳动力外流现象突出，部分地区

出现了农民“拉牛退社”风潮，危及了农业合作社的巩固。充分挖掘农村人力资源，用人力资源换取工业化发展的资金，不失为解决剩余劳动力、巩固合作社和发展农业的极好措施，于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拉开了农业“大跃进”运动的序幕。

农业“大跃进”的发生，源于它的理论依据和政治运作。在理论根源上，在农村进行“大跃进”，通过紧紧依靠农民这个主体，以一种近乎圣洁的真诚，来进行一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越前人的现代化试验，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单一工业化所造成的严重弊病，确保中国现代化之路的纯洁性和中国本土化色彩，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它是大生产经济模式的再现，是大生产运动精神的延续，是百年赶超思想意识的反映；在政治运作上，采取政治动员方式打掉农民的自卑心理，提高其自信心，将思想认识统一到对“大跃进”事业真挚坦诚的支持上。选择适当的运动模式，确立新型的运动理论，凭借严密的基层权力网络结构体系作为组织保障，最终构成了一种全能的基层动员体制。依靠这种体制的广泛运作，使农业“大跃进”得以顺利地发动和开展起来，成为一场典型的群众性社会运动。

党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采取了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鼓励和推广农作物高产典型、广泛开展农业技术革新运动以及大力发展县、社工业等一系列措施；在农业经济体制的构建上，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进行了并村大搬家、公共食堂吃“大锅饭”等共产主义性质的实验。整个过程中，实行“三化”管理，土洋结合和大兵团作战，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强调“一大二公”，用以激发群众的干劲，致使运动波澜

壮阔,但也造成了“五风”泛滥,引发了农村社会的失序。

农业“大跃进”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农业“大跃进”的初衷是好的,切入点也是正确的,初步改善了我国农业的基础设施,表现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但农村社会“变迁”过快,乡土性消失,农民全面依附于人民公社,社会呈现非良性运行。破坏了民主与法制,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破坏了新中国成立后业已形成的新型的社会人际关系,造成了民众素质的下降。教训是深刻的,但也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第一,与时俱进,适时转换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坚决抛弃靠政治运动搞建设的传统思路,聚精会神抓经济,一心一意搞建设。第二,遵循规律,高度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第三,力戒浮夸,科学把握政治社会化目标与现实的关系。第四,提升素质,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监督。建立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强化监督机制,抑止权力的滥用。第五,体恤民情、珍惜民力,确保农民权利。第六,以人为本,努力塑造、培养具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的现代人格。这是对历史的反思,更是时代的要求。

农业“大跃进”已作为一段历史而存在着,时时提醒着人们。今天,梳理农业“大跃进”历史发展过程,审视“大跃进”中人们的种种荒诞表演,挖掘隐没于运动背后的政治、经济 and 人性中深层次的原因,反思党在农业方面的教训,不仅仅是为了不让悲剧在未来重演,更重要的是重新认识“大跃进”运动的历史价值,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促进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建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